

上海面向新世纪的若干思考

Thoughts on Shanghai Facing the New Century

朱荣林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所长,研究员 上海 200085)

上海要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不仅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有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正常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要,更是 21 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可以预期的结果。但正是由于要建成“三个中心”这种目标定位,无论从其空间上或是时间上要求都很高,因而难度很大。如果在对策的确定上,不改变传统思维观念,不在改革的水准和层次上下功夫,不能突破疆域限制,使上海的优势得到最佳状态的发挥,那末这一战略目标有可能落空。对此,我提出如下思考。

一、要高度重视结合部关系的研究,提高和扩大上海的边际效应

当代决策科学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大的威力和作用,这是与它的两大特性相联系的。一是其超前性。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失误,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是立法滞后、决策滞后,“两大滞后”至今还在困扰着我们。二是其综合性。它能系统地观察和处置复杂的问题,特别注意研究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切关联体,也就是结合部关系的研究。我们这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制于牛顿力学的影响。牛顿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以其无以伦比的贡献载入史册,并主宰物理学界近两个世纪。但正因为如此,他的严格假设的实证条件和科学推理上的形式逻辑,至今还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使我们擅长于对事物的分析,而缺乏对事物的综合能力。分析是为了科学的综合,而我们往往舍本求末,以致习惯于将大千世界的万物均视为孤立的、互不联系的一盘散沙。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行政区划的封闭状态、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无不深深地打上了牛顿力学的烙印。

同理可知,我们以往对上海发展战略的研讨也习惯于、擅长于对其自身状态的分析,而缺乏对其自身状态的综合。要综合,必然要注意对其结合部

关系的研究。

上海的结合部有两大系统,一是人为的行政区划系统,二是自然的地理生态系统。

关于行政区划系统,对于上海来说有四大结合部:

1. 国际和国内 由于上海的区位优势所定,她是我国对外交流的中心汇合之处,这是上海开埠 150 年来的近代历史所证明的史实。她凭借四通八达的条件,与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和科技往来。如果,上海能抓住这个结合部的优势,努力提高对国际范围内生产力要素的吸引和配置能力,那么上海自身的力量和优势将大大扩大。要提高这种能力,当前着力要解决的问题是“接轨”。为了“接轨”,上海必须从观念、机制、市政等一系列方面进行“转轨”。没有“转轨”,便无法“接轨”;不能“接轨”,这一强大的国际和国内结合部的边际效应就难以发挥。

2. 中央与上海 上海要成为国内“龙头”,乃至国际“中心”之一,相当意义上将取决于中央支持的程度。中央的支持体现在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央对上海总体上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大政、方针,这是无形的支持;另一部分是中央政府各具体职能和管理部门的支持,这种支持既有无形的支持,还有有形的支持。可以说,在 2010 年(即上海实现“中心”地位的时间定位)以前,中央各部委的职能还会保留相当部分属于计划或管理型的,也就是说手中仍然重权在握。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上海与中央或中央政府各部委在总体上是利益一致的,但是在局部方面(不同的空间或时间)利益也会有一定程度冲突。这是多年来众所周知的现象,今后仍会存在。如何处理和协调好这层重要关系,在不损害全局利益的前提下,确保上海得到中央各部委的足够支持,这就是这一关系的边际效应。

3. 上海与各地方关系 上海与全国兄弟省市的关系,尤其是与长江流域各省的关系是一种互补的重要关系。过去上海始终在决策和制定规划过程

中,没有重视这种关系,往往把它视为老大哥为小弟弟尽义务、作贡献的利益单向关系。其实不尽然,以香港与华南地区省市关系为例,我国 80 年代对外开放之日,正值香港面临危机(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上升)、亟需工业转轨(即经济结构调整)之时,结果由于互补得利,既帮助了香港恢复与发展经济,又带动了以广东为代表的华南各省经济的空前发展。当然,香港与上海也有不可比之处,例如上海承担着重大的利润上缴的任务,而香港是一个独立的国际都市。但是,其相互关系上的边际效应却是带规律性的,即正效应是优势叠加,负效应则是优势抵耗。上海之所以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利益单向的吃亏思想,其根子在于我国长期普遍存在着各省市之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经济趋同的状况。为此,上海要率先在调整经济结构上下功夫,从生产力布局上处理与兄弟省市关系,而且又要在为兄弟省市提供各类服务(包括人才培养、资金融通、技术培训、转口服务等)上与香港比高低,进而吸引全国各地进军上海,形成万商云集之势,也为上海的资源优化配置拓展更广阔的天地。

4. 浦东与浦西 上海的浦东新区建设有其独特的情况,即它是在浦西(上海的代表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单独建市,这与深圳市完全不同。这就出现了一个浦东与浦西关系的问题。上海市政府提出的方针是:“依托浦西,开发浦东,以东带西,东西联动”。笔者认为,这一方针是可取的,但这里必须解决好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依托浦西,必须明确依托的内容,不是全盘依托,例如体制上绝对不能依托,否则会误入“以西制东”之中;二是以东带西,必须体现示范效应,即从体制上改革层次上和功能定位上来带动浦西,否则就有可能仍然是以西制东;三是东西联动,必须是趋于改革的高水准、高层次方向上的动态平衡过程,而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利益攀比。

在地理生态方面,上海恰处于江、陆、海三种生态系统的交会重合处,具有十分强势的边际效应。

边际效应非但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也在人类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而城市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复合生态系统,通常是陆地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的复合体。人类社会及其文明本身就是从沿河、沿海和沿湖等水陆交界地带产生、繁衍、昌盛起来的。原因就是这种地带存在着一种边际效应,这种效应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发生、发展和盛衰。世界上所有最发达的地区无一不是处于某种边缘,几乎所有最繁荣、最有生命力的城市都座落在水陆边缘,尤其是河流入海的口岸。有人估计,全世界水边城市是内陆城市的三倍以上。因此,可以断言,人类文明的发展实际上也同时是人类不断开拓、利用、占领和调控各种边缘地带的过程。

从人类生态学的观点看问题,不同性质的生态系统的交会重合,其边缘地带存在着多种“应力”的交互作用,异质性强,信息量丰富,情况千变万化,因而对非边缘地带那些信息需求高的群体和个体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从而吸引他们向边缘地带集结靠拢。这就是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城市发生发展机制,同时也是正确开发、利用这种边际效应的一把钥匙。据笔者所知,在当代城市科学研究中还没有重视这把钥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缺憾。

从边际理论看上海,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上海依三江(长江、钱江、浦江)而傍东海,正处我国黄金海岸带(也称生产力资源集中的第一经济梯度带)和黄金水道的“T”字形结合部。扼守万里长江入海咽喉,雄居宽阔东海的前哨,这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自从上海对外开埠以来,我国就形成过“五口通商”之势,但真正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全球十大超亿吨级的吞吐大港的至今也只有上海,其源盖出于此。

上海这种“通江达海”的区位条件,形成了交通便捷、人才荟萃、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优势,但在巨大的边际正效应后面,也潜伏着危机,处理不当就会产生负效应,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例如,沿江黄金水道的优势是运输,但沿江工业走廊的形成,对下游入海口的上海水质是极大的威胁。上海人民正在改变祖祖辈辈沿续下来喝黄浦水的历史,决定将取水口置于长江入海处,但是长江中、上游的沿江工业正在形成规模,其中不乏化学工业和其他有严重污染源的制造业。又如,上海沿海的优势,也带来了台风、暴雨、地震、海水倒灌等严重危及市区安全的灾害和隐患。这就涉及到上海滩涂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新课题,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设防等一系列对策。再如,作为国际性的开放都市,万商云集,百舸争流,市区流动人口骤增,人员复杂,社会问题丛生,对上海的经济正常运行和广大市民安居乐业,提出了新的尖锐的治安问题。

二、规划和决策必须建立在多样性的价值体系基础之上

人们日益重视决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是,对于决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认为,应当十分重视价值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其认识有三:一是决策是为实现某一目标而作的方案选择,而目标定位的基础是价值,所以没有正确的价值标准,就无从决策;二是决策是对未来的明智选择,故价值定位中作为主体的人应当是当代人类和未来人类的总体;三是价值体系应当是多样性的,单一的价值体系必然使一个城市规划在面临诸多复杂的问题面前顾此失彼。只有价值体系的多样性,才

能导致决策的科学性、世界的稳定性和人类文明进展的持续性。

上海为建立未来的国际化大都市,参照国际同类大都市的标准,确定了数十项量化指标,这从另一个层面佐证了规划和决策必须建立在多样性的价值体系基础之上。但这里所指的多样性价值体系不仅仅是同一领域里的一系列不同项目的量化指标的组合,而主要是不同领域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协调与平衡。这里包括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长远与近期的关系、增长与发展的关系、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富裕与幸福的关系,以及人的心理需要与生理需要的关系等等方面。就上海而言,应当注意保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同步增长,经济规划、形态规划、生态规划协调统一。具体说来,我们在制定规划和实施决策过程中,应当树立两个新的观念。即:

1. 增长不等于发展、富裕不等于幸福

目前,我国经济的增长,仍然离不开以大量消耗能源为前提,并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据统计,我国每年为环境质量付出的代价约合 950 亿元左右,其中废水污染的代价约为 400 亿元,废气污染的代价约为 300 亿元,固体废弃物污染约为 250 亿元,而且估计这种代价将有增无减。

在全球范围内情况更为严重,财富和产品似乎是增加了,而生态环境却被污染得越来越不适于人类居住了。全球有三分之一陆地被沙漠化,威胁面积达 100 多个国家,20% 人口;包括由于建设性破坏等多种因素,全球每年发生地震 500 万次,并有 523 座活火山待机待发;海洋已成为地球的毒品库,仅放射性污染一项,全球水圈已被约 2000 万居里放射能同位素所沾污,这一污染实际上已经参与了所有生命的代谢循环,其代价无法计算;几世纪乃至几十世纪的文物古迹,经历了数百年、数千年的日晒雨淋而没有受损,却经受不住近十几年、几十年的污染腐蚀而面目全非。

人类的诞生是地球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环境污染固然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年代,但工业革命仍是近代环境严重恶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自从蒸汽机诞生以来,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成员,又作为生态系统的干预者,起着互相矛盾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成因于人们对环境保护认识上的滞后性、与之相伴随的行为的盲目性、决策的主观性。

为避免环境质量继续恶化,重大经济项目的决策者和城市建设的规划者,除了掌握经济、管理、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外,还应重视对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和未来科学的研究和运用,亟待克服以经济指标作为单一价值标准的决策思想。

2. 在大都市向现代化过渡的时期,其抗灾能力和生态平衡的能力是极其脆弱的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的结晶,同时又是人类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场所。但是,由于人口和财富向城市的集中,改变了城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大大减弱了城市对重大自然灾害的承受能力;同时又由于人口、住房、交通、污染、疾病等“城市病”的产生,使大城市生态平衡的能力也相对减弱。

而一个向现代化都市过渡的城市,其矛盾更为尖锐和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基础差、欠账多,自身问题严重。凡是向现代化过渡的城市都有一定的区位条件和经济优势,这样的城市多少都有“城市病”的困扰。以上海为例,四大问题已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人口严重超载;市政建设不堪负担;交通通讯全面紧张;污染严重,环境恶化。这些问题的存在,非短时期内所能解决,而且随时都能引发城市灾害,一旦灾情出现,其放大系数不小,影响面大,会诱发连锁反应,后果极其严重。而本世纪的最后几年是灾害预测频仍的年代,任何侥幸心理都是危险的。因此,我们对上海可能面临的灾情及其后果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二是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和市政建设对城市产生难以估计的压力。现代化建设的初期,城市面临的压力是:第一,新的建设是在旧的城市基础设施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彻底改造的条件下进行的(最多是两者同步进行),此时城市将承受新与旧的双重压力。例如,在人均道路面积几乎没有增加的困难条件下,机动车数增长过快,从而使上海的交通雪上加霜;高层建筑与日俱增,但地下管道的配套及消防设施跟不上,经常出现管道断裂现象,一旦出现火警,只能用低层建筑的消防设施去灭高层建筑的火。第二,由于现代化建设初期缺乏管理经验和人才,在进行城市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容易忽略生态环境和防灾规划,因而在吸引外资过程中缺乏总体规划的指导,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趋重,污染环境的项目不断涌入,以及建设性破坏的现象时有出现。例如,在上海的近期土地批租过程中,就出现供地随意性、地块分散、用地结构趋同,以及批租定价透明度不高等问题。这必然对当前城市交通造成压力,以致对日后上海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所确定的目标产生不良影响。第三,根据我国特定的社会心态,现代化初期的城市建设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多半来自决策者不健康的心态所致。这种心态导致两个错误做法:其一是不敢公开、有针对性地在广大市民中追行防灾教育和演习,以提高全民防灾意识,增强全社会的承受

(下转第 61 页)

入海拔 4 450 米的托索湖,然后分二支:一支向西宁方向发电后入黄河;一支顺河而下经一系列梯级电站后入柴达木盆地。这是充分利用我国自然资源,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的范例。否则,雅鲁藏布江的巨大水资源和水能资源,很难发挥作用。

调水方案可行

首先,调水具备足够的能量。经概算,中游上段提水消耗电力约 180 万千瓦;中段枯水期提水消耗电力 390 万千瓦,汛期提水消耗电力 780 万千瓦;下段枯水期提水消耗电力 690 万千瓦,汛期提水消耗电力 1 380 万千瓦。以上三处枯水期提水总消耗电力 1 260 万千瓦,汛期提水总消耗电力 2 340 万千瓦。它们分别小于墨脱水电站枯水期出力(1 350 万千瓦)和汛期出力(3 800 万千瓦)。如果增加赤白水库的调节能力和考虑扎陵湖的调节作用,墨脱水电站的电力还可较大提高。所以提水动力是有保证的,且有余能供地方使用。

其次,调水具备足够的水量。据粗略概算,调水 260 亿立方米只相当于雅鲁藏布江总水量的 19%,其中从彭错林水库调水 60 亿立方米,占该断面年来水量的 55%。由于水库调节,河道枯水流量基本维持不变,不影响下游用水。羊村附近年调水 100 亿立方米,占河道来水量的 33%。从帕隆藏布江调水 100 亿立方米,占河道来水的 30%。不仅如此,赤白水库有巨大的调节库容,通过水库的优化调度,墨脱水电站的最枯流量仍然可保持在 800 立方米/秒左右。如果增加坝高,蓄水量还可以有较大增加,电站规模尚可进一步扩大。

最后,调水具备所有的其它基础条件。没有到过青藏高原的人,总感到它朦胧可畏。这里海拔高,气候恶劣,给人类活动带来很多困难。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作后盾,设想本身就是荒诞的。如果不看到 21 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这一设想恐怕还有很多困难:雅鲁藏布江距扎陵湖 700 多公里,所经之地基本属于高原丘陵,输水必然会遇到干涸的河槽、大规模的流石滩、局部兀立的山峰、深厚的冻土。这些都要求人们采取工程措施,如隧洞、渡槽、防冻处理等。另外,由于高山缺氧,气候变化无常,

热胀冷缩强烈,施工期短等,都会给调水带来困难。但是,从总的地形、地质和气候条件看,调水是可行的。80 年代初,我国已完成了从青海西宁到拉萨的输油管铺设。虽然规模与调水不能相提并论,但毕竟为高原铺设管道积累了经验。近年来西藏“一江两河”综合开发,也涉及较多的大型工程。它们有力地证明在高原兴建大型工程绝非禁区。更重要的是,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实现这一宏伟设想是完全有可能的。

调水效益巨大

初拟向黄河调水 200 亿立方米,代替西线南水北调。调水量基本满足 21 世纪中叶黄河流域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对水的需求,包括黄河大柳树灌区 6 000 万亩农田灌溉、黄河上中游大批火电站和重化工企业用水。同时利用调水在黄河上中游(包括干流上原规划的梯级电站)和柴达木盆地建立梯级水电站,估计装机在 1 500 万千瓦以上,增加年发电量约 900 亿度,相当于 1990 年全国水电发电量 1 267 亿度的 71%,西北六省年电力消耗 495 亿度的 1.9 倍,年节省标准煤约 3 600 万吨。届时,黄河上中游将成为我国粮食、能源和重化工基地。黄土高原将重披绿装。黄河流域的繁荣又将复苏而更加灿烂。

向柴达木调水 60 亿立方米(如果可能,30 亿立方米送往塔里木)。有人估计,调水后两盆地将成为我国主要盐化工、石油化工和能源、冶金基地,还可发展部分绿洲农业。水是盆地的生命,只要有了水,盆地必将成为西北大地上闪烁的明珠。

到那时,我国东有三峡,西有墨脱两大水利枢纽。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有效地控制了长江、黄河两条巨龙,从而将促进我国尽早形成“水旱从人,民无饥荒”的大好局面。

兴建两个大型水库,需淹没几万亩耕地。西藏人少地多,移民安置工作较容易,且水库建成后,大大改善了雅鲁藏布江谷地的小气候,对下游邻国有百利而无明显弊端。因为河道枯水流量增加,洪水流量减少,这正是印度、孟加拉国梦寐以求的愿望。

(责任编辑 蔡今)

(上接第 20 页)

能力。这种担心的出发点是怕引起“社会混乱”,以致影响“安定团结”。其实,城市抗灾的主体是全体民众,民众的觉悟是防灾的前提,也是使灾情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的可靠保证。其二是担心外商不来投资,因此在介绍投资环境时,绝对不敢言及灾害隐患及其防治对策。其实这又是一种“鸵鸟政策”,外商投资是一种十分谨慎的经济动作,投入产出比

是他们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加之国际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咨询业遍布全球,投资的外商几乎没有不对投资地点的水文、地质、气象及其他相关的自然条件加以关心的。公开介绍,正说明我国已注意到防灾的对策,反而促使外商放心投资。

(责任编辑 蔡德诚)